



张学良

□记者 孟国庆

昨天是12月12日,74年前的12月12日注定要被中国历史所铭记。“西安事变”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,也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,它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。

“西安事变”虽然发生在西安,但事变前后的重要活动多发生在洛阳。时值“西安事变”74周年,我们寻找了很多史料、档案,将在洛阳发生的多数事件串联起来,一窥“西安事变”前后各种势力在洛阳的铺垫、应变、交锋。



蒋介石

“西安事变”前后的洛阳“暗战”

山雨欲来:蒋氏忙内战,抗日呼声高

为迎蒋氏来洛,洛阳大搞建设

洛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,“西安事变”前,洛阳已成为国民政府重要的军事基地。当时,在洛阳驻有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4000多名官兵,两个中队的军事飞行人员。除此之外,在洛阳周边县区也驻扎有国民党重兵。

驻守洛阳的,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主任、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祝绍周。

1936年,这位司令一点儿都没闲着。因为洛阳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,大老板蒋介石时常光临,而

且蒋介石放风说50岁生日要在洛阳过,美其名曰“避暑”,祝司令当然得全力巴结——

为了让领导住得舒适,祝绍周在洛阳军分校院内,专为蒋介石、宋美龄修建了一座小巧玲珑、居住舒服、设备齐全,集住宿、召开小型会议和办公等多项功能的别墅。

为了方便领导来时讲话,他将在西工兵营内吴佩孚时期修建的阅兵台“继光台”翻修一新,并改名为“寿国台”。

为了方便领导登山观景,祝绍

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,动用洛阳、偃师、登封等地的5000余名民工,日夜不停地抢修了洛阳至登封的公路,并在洛阳龙门东香山寺院内,专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修建了一座避暑别墅。

为了让领导出行便捷,祝绍周又翻修了西工飞机场,新建了四幢大型飞机库。

此时的祝绍周没有想到:他翻修的西工飞机场,会在即将发生的轰动世界的大事件中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。

“充满希望”的第六次“剿共”

在讲述那件大事件之前,让我们先把目光西移,看看此时还在西安备受煎熬的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。

1930年中原大战中,东北军和其首领张学良最终倒向了蒋介石,由于其主动出兵入关占领了北京、天津,直接威胁到反蒋联军的后方,导致反蒋联军迅速瓦解。

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,也直接导致东北空虚。日本趁机在1931年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,东北三省沦陷。

东三省的沦陷是张学良心头永远的痛,这不仅使他丢了大本营,而且让他面对国人的指责,他不得不下野出国了一段时间。

而留在关内的东北军,据称还有30万人。到1936年,这30万东北军,除了第53军万福麟部留在河北保定、炮兵6旅黄永安部驻防洛阳执行警备任务外,其余全部被调往西北。

东北军跑到西北干什么?答案是“剿共”。

在经历了1930年至1933年连续五次“围剿”之后,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,由南方到达北方。1936年10月,红军第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,结束了长征。

前五次围剿的“胜利”给蒋介石带了巨大的声望,国民党内外一时对蒋介石一统江山寄予厚望。

对蒋介石来说,就怕“共匪”到处乱窜,现在好了,所有的“共匪”主力都聚集到陕甘一带,而到达陕北的红军力量已经非常弱小,据统计仅剩2.5万人左右。这正是“一锅端”的最佳时机。

于是,蒋介石任命归国的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,他自任总司令,全力“剿匪”!

张学良(前左)与蒋介石(前右)在南京中山陵合影。(资料图片)

蒋介石在洛阳调兵遣将

然而,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低估了红军的实力。

当时,在陕甘一带纠集起来“剿共”的东北军、杨虎城的十七路军、加上阎锡山在山西封堵红军东进的军队,不下50万人。但是,这50多万大军,怎么也吃不掉看似弱小的红军,不仅如此,围剿的军队还时不时被红军整师整团地吃掉。

本想把“共匪已平”的消息作为自己生日的献礼,没想到西北“剿匪”的局面越来越烂。这让在南京的蒋介石坐不住了,1936年10月29日,蒋介石在他生日之前来到洛阳,部署新的“剿匪”计划。

既然东北军“剿匪”不力,那就让嫡系部队上!蒋介石在洛阳调动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、30万人,全部摆在平汉铁路的郑州至汉口段、陇海铁路的郑州至潼关段,并调钱大钧、陈诚、蒋鼎文、卫立煌、朱绍良等20余名军政要员到西安待命,任命陈诚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,驻前方进行督战。

在洛阳,蒋介石还做了“无心插柳”的事情:到达洛阳不久,他就私下单独召见了东北军驻扎在洛阳西工的炮兵6旅旅长黄永安,竭力称赞黄永安“对炮兵很有研究,将来剿共一定能立大功”,并口头许愿让黄永安兼任洛阳地区警备副司令。

蒋介石此时没有意识到:这次召见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。

布置好这一切,蒋介石还没有消停。同年11月11日,蒋介石命令扩建兰州、西安两地的机场,并将在美国、德国、意大利购置的飞机调往洛阳西工飞机场待命。

11月12日,蒋介石到嵩山“游览”时,指示国民党空军对红军所在地进行轰炸;17日下午,他从洛阳飞到太原会晤阎锡山,并于18日返回洛阳;19日,他又马不停蹄飞往山东会见韩复榘,面授机宜。

集结这么多武装力量,都是为了“在一两个月内一劳永逸地剿灭红军”。

变数——绥东抗战

然而,一门心思部署“剿共”的蒋介石忽视了绥远省(现呼和浩特市附近)发生的一场战役带来的影响。

1936年5月,日本侵略军扶植蒙政会德王在嘉卜寺(化德县)成立“蒙古军政府”和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,进扰绥远东部的陶林、集宁等地。

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奋起抵抗,击败了伪军的进攻。

同年11月5日,日伪军再度大举进犯绥东。与此同时,日军出动飞机助战,轰炸平地泉等地,并截断平绥铁路,以断绝绥远驻军的物资接济。

傅作义提出“守土有责,不容坐视”的口号,再次击退了日伪军,取得了绥东抗战的胜利。

绥东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,也在全国再次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,不仅上海、南京的民主人士积极呼吁抗战,就连湖南、四川一带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“哥老会”,也成立了“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筹备委

员会”,提出“打日本、救中国”的口号!

面对全国上下的抗日呼声,蒋介石置若罔闻,仍坚持自己的观点:要抗日?先收拾了共产党再说(攘外必先安内)!

绥东抗战的胜利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带来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:1931年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、1935年的“华北事变”,东北军一再请战,但都被蒋介石否决。

东北军失去东三省的耻辱,也只有通过抗战、打败日本、收复失地才能洗刷。“良(张学良)年来拥护统一,服从领袖,人纵有所不谅,我亦矢志不渝……所日夜隐忍希望者,惟在举国一致抗日耳!”

现在,傅作义却在分享东北军应得的荣耀,而“领袖”蒋介石连这个机会都不给!张学良决心向“领袖”力争一个洗刷耻辱的机会!

1936年10月20日,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到太原,约阎锡山一同到洛阳见蒋介石,共同劝蒋停止内战,一致对外。